

當代
中國大陸
文學流變

張鐘著

當代
中國大陸
文學流變

張鐘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蔡嘉蘋

裝幀設計 洪清淇

書名 當代中國大陸文學流變

著者 張鐘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12樓

版次 1992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32開(140×203mm)224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032·7

© 199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近照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張鐘教授，男，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生於中國吉林省。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在北京大學先後任職講師、副教授、教授，主講文學理論、中國當代文學、當代小說研究等課程。一九八二年應聘為法國波爾多(Bordeaux)第三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文學課程。一九八九年九月任職澳門東亞大學訪問教授，一九九〇年九月始，任中文系主任。

著作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與洪子誠等合著)，《中國當代文學》(與洪子誠等合著)，《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美學論稿》(與張凌合著)及本書。發表論文四十餘篇。

八十年代與中國大陸文學

(代序)

八十年代對於中國大陸的小說創作來說，是非常好的機遇。

第一方面，文學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當然是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文學創作從單一的模式走向了多元的發展，並且，從總的形勢來看，社會默許了多元的局面，這使得小說創作獲得了生機。幾十年來，文學創作從方向（為政治服務）、到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到題材（工農兵）、到形式（普及第一），都作了鐵的性質規定，使一種本來屬於人類自由創造的精神活動，全部限定在固定的思維框架裏，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統一是統一了，生機却凝固化了。這種狀態，一當自我封閉的社會體制被打破之後，必然要自行瓦解，就是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趨勢來看，這種狀態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二方面，是文學觀念的變化。如果說環境的變化是外在條件的變化，那麼文學觀念的變化則是文學質量的變化，但二者有密切的聯繫。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時期封閉型的文化環境，擴展為國際文化環境，迅速地促進了文學觀念的

變化。現代世界各種文學新思維大大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擴展了文學視野，激發了思維方式的革命性演化。請看一看八十年代在中國哪一位取得創作成就的作家不是突破中國文學圈而從異質文學中吸取來新的靈感。王蒙從七十年代末的《最寶貴的》、《悠悠寸草心》轉到《春之聲》、《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說的創作，張承志小說與艾特馬托夫以及與梵高印象派繪畫的關係，卡夫卡、福克納、馬爾科斯、加繆與一系列八十年代出現在文壇上的中國作家的關係，都可以深刻地感覺到。即或堅持傳統寫法的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也吸取現代主義的因素。至於各種現代哲學觀念文藝思潮對當代小說的滲透，那更是歷歷在目。近十年，外國現代文藝思潮與哲學思潮對中國的湧入，如同決堤了的洪水，在偌大中華的黃土地上四處流淌。試想，外邊的哲學世界和文學世界已經熱鬧喧騰了近一個世紀，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外部世界的迅速發展的形勢，促使理論觀念與思維方式發生了許多演變。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社會主要是在政治鬥爭的領域中運轉的。近十年，當長期的反覆不斷的政治鬥爭從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後退了以後，社會和人羣長期被政治鬥爭抑制了的經濟、文化的飢渴就變成了吸取世界文化思想的主動行為。甚至來不及選擇，帶着驚疑和新鮮感想要把二十世紀的缺課短時間就補過來，這不免過於性急並注定會消化失調，但它產生的效應却是推動了文學觀念的更新和小說形態的出新。

第三方面，這種形勢所形成的一個奇觀是，中國文學這十年的歷程濃縮了世界文學近百年的歷程，西方二十世紀所發生的文學流變，中國在近十年裏又發生了一遍。從二十世紀初葉

的意識流，新感覺派到五、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荒誕派，直至七、八十年代的魔幻現實主義，都在中國風靡一時，從傳統現實主義到現代和後現代思潮，從通俗文學到實驗小說應有盡有。儘管不乏二手貨三等品，却是以使人眼花繚亂。這一紛繁的局面，變化節奏相當快。今日的新潮，過了一年半載就成了昨日黃花，剛剛嘗試了意識流，馬上又轉向了新感覺派，今天寫的是鬧市的燈紅酒綠，明日又奔向原始蠻荒之地去尋根問祖，這邊的薩特熱剛剛點火，那邊的老莊熱又冒起了烟，躁動的文壇像着了魔似的旋轉着。這一狀況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社會精神現象的寫照。

在舊的一統文學被衝破了以後，不同哲學背景和文化背景，不同審美觀念與價值觀念的文學彼此共存和衝撞，這就是所說的多元的局面。

第四方面，經過八十年代的躁動和旋轉，產生的最大效應是文學思維的解放。思維方式變化了，文學面貌也變化了。特別是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小說創作，新的哲學觀、文學觀開始從文學觀照的出發點上改變着文學的創作方式。因此，新形態的文學作品就不斷湧現出來。像《紅高粱》不用說與《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這類作品區別巨大，就是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區別也是很大的。區別在哪裏？區別之一就在於創作主體獲得了自由的精神，就是說，一當主體內在的自由感和獨立感確立之後，它的創造性就獲得了發揮的可能性。它對對象的表達就不受原有模式的限制而尋求新的主體精神表達的可能性。八十年代的文學和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富創造活力的年代，創造精神、探索精神、突破精神，對傳統的

審視和批判精神，都是創作主體生發出活力的表現。

第五方面，從多元並立中看到的是不成熟的思想內核。缺少的是沉穩的深刻性，多的是時髦的浮躁氣。當一個世紀所形成的千百種學說流派一下子展現在眼前的時候，眼花繚亂的眩惑感最易產生趨新若驚的心態，使得創作和理論處於短期行為的控制之下，熱得快，轉移得快，來不及結出沉實的思想之果，一方面是探索的鋒芒，一方面是浮躁現象，共存於一體之中。時裝的改換，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氣度和素質的提高和變化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創作和理論尚缺少具有獨立哲學觀和文學觀，既具有獨立旗幟又有文學實力的流派。流星閃爍，明滅飄乎，如同今天流行的口頭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天”。有一些很難說領了風騷。思想的元、潮流的元，總該有自己獨立自在的體系，細一考察大都是混沌狀態。這說明作為文學內在基礎的思想與理論上的幼稚和不成熟。這一問題不單是在文學方面，在中國現代史上幾乎不曾產生獨立的新思維的哲學家，或者擺脫不開中國傳統哲學的羈絆，或者越不出西方哲學的思維形式，缺乏超越能力，表現了中國文化思想在近百年的疲軟狀態和哲學生命力的貧乏狀況。

與此相關的是關於文學主潮的不同看法。首先是有主潮還是無主潮？有主潮論者角度和層次也不一樣，人道主義主潮論、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論、文明與愚昧的衝突論，這些都是在社會思潮的層面上來界定文學潮流的思想內容的。現實主義主潮論、現代現實主義或現代浪漫主義主潮論、民族意識與現代傾向主潮論，前幾年我在講課中曾提出民族反思與文體更新的說法，我並不把這看成是主潮，只是看作構成一股的重要文學

潮流。這些看法是從文學思潮的角度提出來的。無主潮論則認為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處於無序的多元交錯雜陳的狀態，談不上哪一元處於主潮地位。

有主潮與無主潮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有內在相通之處。無主潮論的內涵是多元並立，有主潮論者那些不同的主潮也是並立多元的，這等於把主潮（一個潮流為主）自行消解了。儘管有無主潮還難以確認，但總的趨勢却是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新質文化的創造與產生。

第六方面，在邁向九十年代的時期，作家的創作進入了一個艱難的時期。有人感嘆文學失却了轟動效應，有人悲哀文學從馬路中央被擠到不起眼的角落裏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學確實扮演着社會代言人的角色，積鬱已久的社會情緒通過文學這條渠道向外渲泄，一時間文學成了救世主，甚至還兼有檢查官與法官的職能。在民主與法治不正常的社會條件下，文學的這種奇特作用是不難理解的，但這並不是文學的正常狀態。一當社會輿論的多種渠道打通之後，文學被當作易於引起轟動社會輿論的角色就會逐漸淡化了。

現在面臨着整個社會都被商品經濟和金錢萬能的浪潮衝擊得六神無主的時候，文學倒應該冷靜一下審視自己的地位與自己的選擇。

回過頭來看，前一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容易突破、比較容易創新、比較容易實驗、比較容易模仿、也是比較容易轟動的時期。文學處在比較容易的層次上。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文學的起點太低，到處是禁區，所以就很容易突破，沒有什麼探索，所以一探索就打響，遍地的社會問題，一觸及就轟動。在這種

形勢下，社會給予文學的期望與優惠也較為特殊，一篇小作品打響就可以使之成名，社會地位也可以隨之改觀。

現在呢？文學的外部條件與內部條件都在改變。從外部條件來看，在社會以商品生產為中心的運轉過程中，文學的社會名次顯然後移了，文學在社會上的審美職能將會突出出來，當然也使它具有精神消費品的性質，作家將從被封為“靈魂工程師”的尊位上還原為普通的社會成員。這難免使作家們產生失落感。從內部條件看，文學已經越過了比較容易的層次，在經過了十年的闖蕩和遊歷之後，孕育着獨立操作的渴望，要把自身的經歷上升為更高理性階段，走上真正獨創性的艱難歷程。

中國作家不能停留在經驗階段而應發揚想像力和創造力，以想像力和創造力重鑄經驗，那才是文學創造的高境界。當然，想像力與創造力要藉助於人類創造的既有經驗作為出發點，那麼以遲到者的心態掃蕩一切突出自己的方式並不是真正的創造，那是回到原始野蠻人的出發點，在現代文明世界裏可能成為文化怪物。

本來我們的精神喪失已經太多，這十年的文學大都在消耗着已經喪失殆盡的精神軀體，無論是無節制的處於對精神喪失的痛苦悲泣之中，或者是以玩世不恭所進行的精神遊戲，同樣都是一種精神喪失。與此相關的另一面，現在是需要建立起個人的精神立場，樹立起獨立的精神學說，形成支撐起新的歷史進程的精神力量。

歷史為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現在中國社會正處於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化，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由權治社會向民主法治社會的轉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社會正

處於從幾千年來形成的深厚的傳統文化心理和思維觀念中蛻變出來的大轉變時期，挑戰與機遇同時擺在作家面前，無疑，這是一個出現傑出文學的時代機會。

在歷史轉變的艱難歷程中，偉大的傑出的作品，在現今的世界上，不可能是思想藝術都很單純的作品，必定是含蓄了複雜的社會、人生巨大矛盾以及創作主體自身的巨大矛盾的作品。因為，當今的世界被它自身的巨大矛盾所籠罩並且帶給人類的是巨大的矛盾感。對這一巨大的矛盾感必然會被傑出的作家深刻地感悟到、體驗到，並且加以藝術的呈現。本世紀出現的傑出作家無不是深刻地感悟到世界和人類自身的巨大矛盾的巨大精神個體。

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不同程度地體驗到了社會和人自身存在的巨大矛盾的深刻性。反思，成了貫穿在八十年代文學中的主題，由現實社會，到歷史文化，到人本的反思歷程，已可窺見八十年代中國小說的運轉軌迹。矛盾感知的深刻性與藝術呈現的水平，是當代小說生命力的基礎，並由此可能產生傑作。

目 錄

八十年代與中國大陸文學（代序）	iii
一 反思與尋根.....	1
二 探索人本的隱秘領域.....	24
三 心理情結的限度	
——王蒙文學現象	35
四 在自我意識與社會困境的兩難中	
——近年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人物.....	48
五 土地的靈魂	
——高曉聲與鄉村小說	57
六 從“問題小說”到都市風情畫	
——劉心武小說的演變	72
七 在現代與傳統的交叉點上	
——陳建功的當代城市小說	85
八 探求者的悲壯長旅	
——張承志小說中的探求者主題.....	90

九	尋找失去的精神家園	
	——莫言小說中的兩個世界	99
十	實驗小說思潮	111
十一	敘述的實驗	
	——小說中的馬原文體	119
十二	夢魘的遊歷	
	——殘雪的小說世界	127
十三	新思潮與小說的向內轉	134
十四	小說向本體的回歸	144
十五	大陸文學思潮流變	152
十六	當代文學的轉變	162
十七	當代文學的歷程	181
十八	當代文學的超越	194
十九	當代中國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	200
	後記	204
	附錄：參考書目	205

一 反思與尋根

民族大反思，這是七十年代後半期和八十年代出現在中國的一股社會思潮。中國人在近一個世紀裏思索、實踐，為尋求國家與民族的出路苦苦奮爭，歷經磨難和坎坷，獲得了解放，然而，十年“文革”浩劫再一次把民族推進災難的深淵。從浩劫中甦醒過來之後，在一次再次的歷史教訓之後，面對着一個開放的現代的世界形勢，不能不引發出一場民族的大反思。

作為民族精神載體的小說內容，反思的主題有三個不同的層次與側面，反映出反思的深廣程度，即現實社會的反思，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思，人本的反思。這三個不同的層次與十年來小說內容在三條線路上的深化形成一種對應的關聯，即對現實社會認識的深化，對歷史文化的深化，對民族深層心理的深化。

(一) 反思和社會分析小說

社會的反思與對社會現實狀態的認識的深化，是同步展開的。由“文革”的創痛引發出的社會反思意識，最直接地指向

就是對當代政治事件的反思，對現實社會發展過程的反思，對社會結構的深層認識。也可以說是社會自我意識的復甦。

由傷痕文學為開端的反思小說，把它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從“文革”向前推移至五十年代，反思小說之所以把它的描寫範圍推移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甚至更遠，因為人們意識到“文革”這場大禍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有它的深刻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淵源。當然各篇作品與各個作家所做的社會分析會各不相同，所提供的社會圖景也各自相異。《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鵝）、《芙蓉鎮》（古華）、《李順大造屋》（高曉聲）、《張鐵匠的羅曼史》（張一弓）、《古船》（張煒）。這批作品與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小說相比較，作品的着眼點有着明顯的不同，即已不是農民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而是農民與擺佈他們的極“左”路線及其執行者的矛盾以及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痛苦。老甘在不同年代的不同行為的民心向背（《剪輯錯了的故事》），政策與民情的對立中造成的李銅鐘的悲劇，胡玉音與李順大命運的波折坎坷與社會動蕩的聯繫性，都是寫得很深刻的小說。

另一類反思小說，如《布禮》（王蒙）、《蝴蝶》（王蒙）、《洗禮》（韋君宜）、《綠化樹》（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張賢亮）以及較早出現的《天雲山傳奇》（魯彥周）、《月食》（李國文）等作品，從幹部、知識分子的經歷中，通過對人的地位與異化現象的揭示，反思沉痛的歷史教訓。張思遠（《蝴蝶》）、王輝凡（《洗禮》）在遭受了“文革”的變故之後，引起他們的自省、自責和痛苦的反思。張思遠的變異過程，不僅使他失掉了海雲，更重要的是他作為錯誤政策的執行者怎樣逐漸背離了

人民，因此他苦苦地尋找與人民相通的靈魂。王輝凡在自己遭受磨難之際，痛切地認識到“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過去我亦曾刑人”。這類人物的變異過程並不單單是由他們個人品格造成的，他們所反映的是社會結構中的弊端所生成的結果。章永璘（《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經歷提供了更為沉重的反思內容。章永璘這個被政治拋棄了的知識分子却真誠的在苦難的歷程中追求對政治的認同，表現了知識分子悲劇性的時代處境。

反思小說的社會分析，觸及到社會結構核心部位即權力結構的分析，是令人警醒的。《西望茅草地》（韓少功）所刻畫的張種田的形象，由於他頑固地以農民小生產者的觀念與方式來統治他的領地，使他統轄下的茅草地衰敗破落，被歷史遺棄，張種田也由茅草地的“酋長”變成了一個乞丐式的可憐蟲。在現代歷史條件下，對農民當權者的剖析，對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具有現實意義。《秋天的憤怒》與《古船》（張煌）所提供的社會背景，令人深思。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掌權地位的莊稼漢子蕭萬昌，他從古老中國歷代農民出身的統治者身上繼承了衣鉢，很會利用他鄉中的權力結成勢力集團，經過三十多年的政治風雲、家族矛盾、村仇械鬥，每次都越過了風口浪尖，統御着小村，手段也越來越老練高明，整個村莊就像由他駕駛着的一個巨大的輪子，他認為需要旋轉一下的時候就伸出手指輕輕一撥，輪子就會按着他的意志轉動。一當歷史形勢變化的時候，他也會很順當地把形勢的駕駛權以新的方式把握在自己手裏。當承包的形勢來了，他順勢就把集體工副業承包給他權力圈中人。這些人對他感恩戴